

周青浮 范荣华● 著

SHENGJI BIANJIE PILIN DIQU SHIYU
JINGJI FAZHAN RUOGAN WENTI SHIZHENG YANJIU
JIYU HENANSHENG NANYANGSHI DE MIANBAN SHUJU

省际边界毗邻地区市域 经济发展若干问题实证研究

——基于河南省南阳市的 面板数据



西华电子科大出版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课题：河南不同区域发展定位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课题批准号：2014BJJ091）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公室课题：加强河南省与周边省份合作研究（课题批准号：2012B475）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河南省与周边毗邻地区联动发展机制问题研究（课题批准号：132400410512）

省际边界毗邻地区市域 经济发展若干问题实证

——基于河南省南阳市的 面板数据

研究

周青浮 范荣华◎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省际边界毗邻地区市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实证研究:
基于河南省南阳市的面板数据 / 周青浮, 范荣华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43-4209-8

I. ①省… II. ①周… ②范… III. ①城市经济—
经济发展—研究—南阳市 IV. ①F299.27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5906 号

省际边界毗邻地区市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实证研究
——基于河南省南阳市的面板数据

周青浮 范荣华 著

责任编辑	陈 斌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中铁二局永经堂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17.75
字 数	445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209-8
定 价	6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言

省际边界区位于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与本区域的其他部位相比而言，其经济发展往往容易被忽视。历史和过去的事实表明，这却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大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

我国幅员辽阔，省际边界线漫长，边界地区面积巨大。目前，我国共勘定省界 68 条，总长 6.2 万多千米。其中陆路边界线总长 5.2 万千米，分布着 849 个县（市），占全国总县数的 39%。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均与其他省市自治区毗邻，如山东省有 8 个地级市与外省毗邻，浙江省有 13 个县（市）与外省交界，湖北省边界地区涉及 37 个县（市、林区）的 144 个乡镇。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省际边界地区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省际边界地区发展慢，实力弱。2010 年，我国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人均 GDP 最低的省内边缘地区的平均差距为 6.13 倍。山东省省际边界地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占全省总量的 50% 左右，但 GDP 总量却仅占 30%。湘鄂边界 20 个县市区，2011 年 GDP 总量为 1 134.9 亿元，财政收入为 80.23 亿元，分别约占两省县市区 GDP 的 10.4% 以及财政收入的 7.6%。就河南省而言，地处中原，与周边 6 个兄弟省相邻，共有沿边县（市）43 个，占全省县份的 36.4%。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特别是受边界地区行政分割和经济贸易壁垒这种边界经济负效应等的严重影响，使经济发展迟滞，目前仍比较贫困。据统计，全省现有 34 个贫困县，有一半分布在边界地区。为此，这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已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转折。

省际边界地区较为偏远，发展边缘化。区域划分的准则是行政管理区域与自然单元的吻合，而界线常常是较为偏远的山地分水岭或河流，从而使其往往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就豫鄂陕三省而言，郑州、武汉、西安省会经济及其城市经济圈，将永立区域经济的潮头；三省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多集中在交界的伏牛山区和桐柏山区。

省际边界地区是资源富集区、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据统计，省际边界地区煤炭储量至少有 3 000 亿吨，占全国总量的 40% 以上。不少旅游产业密集带大都跨越了省级行政边界，如大三峡旅游区、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等。湘赣边界地区、闽浙赣地区、鄂豫皖地区、湘鄂川黔地区、太行山区、陕甘宁边区等，都是革命根据地。西藏、四川、云南三省间是藏彝走廊，瑶族、侗族主要聚居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地区，鄂湘黔渝四省市交界处聚集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30 多个少数民族。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因此，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尽快实现省际边界地区经济的崛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使上述地区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改革的丰硕成果，共筑“中国梦”，已成为广大学者和各级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笔者近年来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以河南省省际边界地区，特别是豫西南的南阳市市域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实证研究的视角，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

的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若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其研究现状、相关理论、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一些相关单位的认同，但由于时间仓促和自身能力所限，文中所涉及的有关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正。

笔者

2015.02.20

目 录

第一篇 区域协作发展问题	1
1 问题的提出	1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	1
1.2 选题的意义	2
2 研究现状述评	3
2.1 国外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	3
2.2 国内对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	3
3 相关理论	4
3.1 次区域含义及其特征	4
3.2 多层治理理论	6
3.3 区域一体化理论	8
4 次区域合作成功的典范	10
4.1 欧盟经验	10
4.2 新-柔-廖成长三角	11
5 河南省及其周边概述	12
5.1 河南省经济发展概况	12
5.2 周边经济区(圈)概况	12
5.3 河南省与周边省份区域合作的历史	13
5.4 河南省与周边次区域合作的新特征	14
6 河南省与周边区域协作机制的方针及内容	15
6.1 与周边省份的联动发展	15
6.2 构建多层次区域合作治理体系	19
6.3 创新政府在次区域公共管理中的主要职能	20
7 案例分析:南阳市与周边省份的合作	22
7.1 南阳市呈现“政策凹地”的发展态势	22
7.2 南阳市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定位	23
7.3 当前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7
7.4 构建汉江淮河中上游区域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29
7.5 与周边省份合作的对策	31
8 结论	35
参考文献	36
第二篇 产业集群发展问题	40
第一章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	40

1 问题的提出	40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40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41
1.3 论文研究目标与内容	44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45
2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探讨	45
2.1 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	45
2.2 用社会资本网络与信任两纬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必要性	48
2.3 产业集群背景下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	49
3 网络与信任对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传导机制分析	51
3.1 信任对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传导机制	51
3.2 网络对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传导机制	53
4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中社会资本与集群发展的关系分析	54
4.1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产业的发展背景及总体状况	54
4.2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的企业社会资本因素	55
4.3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企业基于网络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实证分析	58
4.4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发展实证分析的总体结论	61
5 对促进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的建议	61
5.1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发展还存在的问题	61
5.2 对积累社会资本、促进镇平县玉器加工业集群发展的建议	63
6 结论与展望	65
6.1 研究结论	65
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65
6.3 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66
参考文献	66
附录	68
第二章 网络结构与产业集群	70
1 问题的提出	70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	70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71
1.3 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及网络组织研究的文献综述	71
1.4 本部分研究的思路、方法、内容、技术路线与创新之处	79
2 研究的相关理论述评	81
2.1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概念辨析	81
2.2 产业集群理论的运用与实践	81
2.3 产业集群的概念内涵	82
2.4 产业集群网络的界定和解析	82
2.5 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及其效应	83
3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及其网络结构基本情况	85

3.1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的基本情况	85
3.2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基本情况	92
4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产业集群的产业网络结构	94
4.1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产业网络结构的基本情况	94
4.2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网络结构	94
4.3 玉器加工业产业集群同一产业链网络结构	95
5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的市场网络结构分析	98
5.1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的市场主体	98
5.2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的市场网络结构	98
5.3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市场网络结构的效益分析	99
5.4 玉器加工产品专业市场	101
6 镇平县玉器加工业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结构	102
6.1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基本情况	102
6.2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机制	102
6.3 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作用强度演化	104
7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培育的对策研究	105
7.1 强化网络协作功能,营造良好的玉器加工产业集聚氛围	105
7.2 激励企业创新协作,推动企业有机整合、协调发展	105
7.3 积极培育大企业、大集团公司,打造区域品牌	106
7.4 引导玉器加工企业进一步密切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协作	106
7.5 加强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服务功能,完善服务体系	107
7.6 引导玉器加工企业拓展融资渠道	107
8 结 论	108
参考文献	108
第三章 地方政府与产业集群	112
1 问题的提出	112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112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13
1.3 研究主题和内容框架、方法和思路	118
1.4 可能的创新点	119
2 地方政府与产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	119
2.1 几个基本概念	119
2.2 政府管理集群的必要性	123
2.3 政府管理产业集群的适度性	125
2.4 政府管理与产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	126
3 在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集群政策变迁	127
3.1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条件及优势	127
3.2 地方政府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集群政策变迁	130
4 案例:镇平县地方政府的政策在玉器加工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133

4.1	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的发展简史、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的现状	133
4.2	政府投入与集群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134
4.3	对镇平县玉器加工产业集群政府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分析	135
4.4	从集群政策看地方政府在镇平县玉器加工制造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136
4.5	镇平县玉器加工制造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发展的政策	137
5	结论与展望	139
5.1	本部分研究的主要观点	139
5.2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39
	参考文献	140
第三篇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发展	142
第一章	科技创新	142
1	问题的提出	142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42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43
1.3	研究方法	144
2	产业集群式技术创新的相关基本概念与理论	144
2.1	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	144
2.2	产业集群创新的含义和特点	151
3	南阳市中医药企业技术创新集群类型及模式的现状分析	155
3.1	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155
3.2	南阳市中医药企业技术创新集群类型	155
3.3	企业技术创新集群模式与省内外比较	156
3.4	实施集群式创新战略的对策建议	159
	参考文献	168
第二章	人力资本问题	171
1	人力资本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	171
1.1	人力资本的概念及类型	171
1.2	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72
1.3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性分析	173
1.4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	174
2	河南省区域经济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77
2.1	河南经济发展现状	177
2.2	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分析	179
2.3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80
3	人力资本投入与河南经济持续增长的实证分析	181
3.1	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	181
3.2	技术进步与内涵式增长	185
4	河南省基于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考	189
4.1	人力资源开发的性质	190

4.2	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0
4.3	河南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191
4.4	河南省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193
4.5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衍生后果和原因分析	195
4.6	河南省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对策	196
5	案例：南阳市农村富裕人力资源转移问题	198
5.1	南阳市农村人力资源基本情况及转移现状调查分析	198
5.2	南阳市农村人力资源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202
5.3	南阳市农村人力资源转移的战略与对策建议	205
6	河南农村人力资源投资的战略对策	214
6.1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界定	214
6.2	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投资的现状	214
6.3	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215
6.4	农村人力资源投资的战略对策	216
7	结 论	217
第四篇	农业结构转型问题	219
1	提出问题	219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219
1.2	研究方法	220
1.3	研究问题	221
1.4	研究框架	222
2	理论基础	222
2.1	农业产业化理论	222
2.2	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理论	223
2.3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223
2.4	区域经济干预理论	224
2.5	技术创新理论	225
2.6	需求理论	225
3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转型状况	225
3.1	案例村选择	225
3.2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现状	226
3.3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演变	227
3.4	农业结构转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28
4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230
4.1	农民自身的趋利行为是促使农业结构转型的原动力	231
4.2	政府支持为农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外在保障	231
4.3	技术进步推动农业结构转型	232
4.4	现代市场要求农业结构转型	235

4.5 消费需求变化迫使农业结构转型	236
4.6 村落精英引领农业结构转型	237
5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转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238
5.1 找子庄村农业结构转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38
5.2 促进农业结构有益转型的途径及措施	240
6 结论与讨论	243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243
6.2 本研究尚存在的主要问题	243
参考文献	244
第五篇 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247
1 问题的提出	247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目的及研究意义	247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248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技术路线与创新之处	250
2 相关理论述评	251
2.1 区域发展模式相关理论	251
2.2 县域经济相关理论	253
3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258
3.1 西峡县自然、人文环境概况	258
3.2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259
3.3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变化情况	264
4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界定	268
4.1 西峡县与条件相近的县域发展比较	268
4.2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	269
4.3 西峡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界定	270
5 制约西峡县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及成因分析	270
5.1 制约西峡县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270
5.2 成因分析	272
6 西峡县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分析	273
6.1 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对策	273
6.2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	273
6.3 城镇化水平提升对策	274
6.4 区域协调发展对策	274
6.5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274
7 结 论	275
参考文献	275

第一篇 区域协作发展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1.1 问题产生的背景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纷纷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维护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各国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强烈的经济合作需求与愿望。但是,在存在较大差异或者说异质的国家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建立具有排他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难度较大,次区域经济合作(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方式是一种符合实际的必然选择。一种观点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东亚地区在实践中产生的一种适合于各有关经济体的共同发展方式^[1]。从经济学观点看,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在次区域地缘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给合作的各方带来共同的经济利益。次区域经济合作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在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图们江流域、大湄公河流域、东盟北部地区、东盟东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就属于上述范畴。应该看到,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尚处于发展阶段,即便是在概念上也无公认的界定,因此,对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特别重要。

放眼全球,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方兴未艾,但我们应当看到,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合作目标分散化、非制度性、欠稳定等状态,即便是一些基本范畴问题也未形成十分一致的观点^[2]。因此,有必要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种种现象加以研究,找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和对策,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研究和探索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界定其基本范畴,并寻求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相互衔接或过渡的载体。因此,笔者将在界定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外主要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问题,并以河南省与周边省份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心,借鉴当今重要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的经验,进一步探究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路径等一般规律。

随着中国加入 WTO、对内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区域合作越来越紧密,其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区等重要的经济区域。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倾向于让各省进行独自资金运作,以此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一

条途径。地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省考虑的,通过各个省的计划,把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具体化。这种做法,在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能够起到指导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现在,全国和每个省区的经济都有了相当大的规模,经济模式已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上。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按过去的方法做,就极不适应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全国统一市场格局下,仍然可能出现各个区域市场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有重点的推进态势,形成各类有特色的经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

1.2 选题的意义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部腹地,是我国目前已存在的较大经济区划中原经济区筹建的发起者,也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属次区域发展的范畴。河南省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之一,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区域物产和劳动力资源以及巨大的购买力市场,对东部沿海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这里处于我国由东向西的技术梯度和由西向东的资源梯度交汇区以及南北沟通的交通枢纽地区,对我国东西部发展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由于地处中部腹地,又是我国冬小麦主产区,对全国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南省自中原经济区筹划以来,在融资渠道、人才、技术、信息交流、企业的联合与协作、双边多边联合项目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省内各地市的经济水平不一,研究与周边毗邻地区的联动发展机制,对于进一步整合区域资源、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具有现实意义。

南阳市地处豫西南,属中部地区,毗邻陕西、湖北两省,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位于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武汉大都市圈的外围结合部。辖区北、西为秦岭支脉伏牛山地,南部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别山桐柏山地,属典型的盆地地形构造。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处于落后位置;在中部崛起中,由于远离中原城市群,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如何实现“政策凹地”的突破,避免在中部崛起与东西部发展中不被边缘化,力争成为周边三大都市圈间城市新星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南端“领头羊”,已成为一千万南阳人民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目前关注此类问题的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纵观南阳市周边毗邻区域,与其经济区位相似的还包括湖北的襄阳、十堰、随州,陕西的安康、商洛和本省的信阳等地市,这七个地市同处汉江淮河中上游地区,均处于东引西进、南北沟通的中枢位置;周边环境类同,都远离中心城市,处于三大都市圈结合部、省际边界地区;同处于鄂豫陕、鄂豫皖革命老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接近;自然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因此,在求解区域内部发展策略的同时,联络带动周边地市,建立汉江淮河流域中上游经济一体化经济协作区,依托协作机制,实施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南阳市以“政策凹地”突破、带动经济发展腾飞的有效途径之一。

笔者以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为基础,对河南省与周边毗邻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联动发展机制展开深入的研究,这对加速推进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现状述评

2.1 国外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

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的飞速发展,理论研究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术研究的分类更为细化,研究范围更为专业化。由于研究的范畴越来越小而具体,这样使次区域经济从区域经济的分化出来,以次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地方或局部区域合作问题,显得更为具体和必要,次区域合作理论日渐发展和充实起来。可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催生了次区域理论,反过来,次区域理论的完善,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次区域合作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东亚地区的一种经济现象。在过去的研究中,次区域合作又被称为增长三角(成长三角)、自然的经济领土或扩展性都市区域。首先出现的次区域合作是在1989年12月,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之间的三角地带建立经济开发区,并称之为增长三角(成长三角, Growth Triangle)^[3]。1993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曾指出:次区域合作是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精心界定的、地理毗邻的跨国经济区,通过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来促进外向型的贸易和投资。该概念被用来具体指称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地区、东盟北部地区、东盟东部地区的区域合作行为^[4]。可见,亚行的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三个或三个以上主权国家部分相邻领土构建次区域合作组织,它强调了地理区域性和局部性。

有的学者把次区域合作看作是自然的经济领土的范畴^[5]。美国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于1992年提出了自然的经济领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概念,其缩写为NETS。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指出,自然的经济区域指的就是跨越政治边疆的自然的经济互补性。这里所谓的自然,并不是说政府不参与其中,而是指政府为促进该区域内的要素自由流动而做出的相关干预,即为实现自然的经济领土内的经济合作需要政府的宏观管理^[6]。一些学者从城市扩展的角度研究次区域合作。T. G. 麦克吉(T. G. MaGee)和斯科特·麦克劳德(Scott Macleod)1992年通过对新柔廖增长三角的研究,撰文提出了扩展的大城市地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的概念,认为新加坡的周边地区——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可以通过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而成为都市新加坡的扩大部分。

2.2 国内对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

1998年,魏燕慎主编的《亚洲增长三角经济合作区研究》一书,是国内对增长三角进行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该书在世界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亚洲增长三角经济合作区展开相关研究,不仅仅研究了我国的相关增长三角,只是没有明确以次区域的概念进行相关的表述和说明^[7]。陈才等学者认为,次区域合作是相对于区域合作而言的,指若干国家和地区接壤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自然人或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生产领域内,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开展的较长时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在经济范畴上,它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

余曷雕认为,要成为某种形式的成长三角,至少要具备地理上的邻近性、经济上的互补性、政府间相互协调的可能性等。在能够考虑到的诸多因素中,有两点显得尤为重要:一是该成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资金的吸引力;另一个则是各点、腹地对成长三角地区的潜在与现实的支持程度^[8]。王胜今认为,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中还存在着更低级的形式和阶段,其并没有纳入到以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框架之中。增长三角模式就是低级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模式。其本质表明,次区域经济合作阶段属于更为低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低级阶段或准备阶段。李玉潭在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过程中,论述了关于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并将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环日本海开发、环渤海地区开发列为次区域开发范畴。施本植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还是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特定阶段,推动这一进程的宗旨是消除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障碍,实现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所带来的高效生产以及成本降低这样的目的。贺圣达等指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次区域这个地缘范围内的趋向自由化的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主要表现为在这个地缘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因而,在经济范畴上,它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性和经济资源的互补性共同形成了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刘均胜认为,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地理范围的限定,他认为在一个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下的各种经济合作安排都属于次区域经济合作,其具体形式划分为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合作、增长三角和目前达成的将来有希望演变为国家间自由贸易区的双边贸易协定,等等。丁斗给出了狭义的定义,他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指小范围的,被认可为一个单独经济区域的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它依赖于边界双方一定的制度建设。张兵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域基础、合作机制等次区域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澜沧江-湄公河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李铁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次区域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在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合作现象,并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3 相关理论

3.1 次区域含义及其特征

3.1.1 次区域的含义

次区域,又称亚区域,是指相对于某一地域范围而言,涉及多个国家(地区)的,因一定的关系而联结起来并被一致认可的较小地区。次区域的范围可大可小,主要看相对于哪一区域^[9]。比如,相对于几个大洲而言,在一洲之内,涉及范围较大的组织(非洲统一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可以称为次区域;一国之内的几个地区组成的共同体(如华南经济圈、长江流域经济圈等)也可称为次区域。

从次区域所涵盖的成分来看,有以下几种组成形式:多个国家组成的次区域(或可称为纯国家结构的次区域)、多个或一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次区域(或可称为国家与地区混合结构的次区域)、多个地区组成的次区域(或可称为纯地区结构的次区域)^[10]。多个国家组成的次区域,组成一体的是独立的几个国家,其内外协定和政策措施都是分别从各自国家

的角度和层面来完成的。这种类型的次区域有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安第斯集团（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联盟等。多个或一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次区域是指参与主体中既有国家，又有其他国家的一个或几个地区，其对内对外协定和政策是由国家和地区两个不同层次的合作方共同完成的。这种类型的次区域有新－柔－廖成长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廖内群岛）、环日本海次区域（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朝鲜、韩国和日本组成）、澜沧江－湄公河经济区（中国云南省、泰国、老挝、越南的北部地区、缅甸的东部地区）等。多个地区组成的次区域是指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几个地区组成的合作体，其对内对外协定和政策是其内部组成地区之间共同完成的。这种类型的次区域有环黄渤海次区域（中国的辽东半岛、环渤海沿岸地区和山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的北九州及西南地区）、东南亚北成长三角（马来西亚的檳城、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泰国南部的普吉岛）等^[10-11]。

3.1.2 次区域的特征

无论何种组成形式，次区域都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相对性。

次区域是相对于其上一级区域而言的较小地区。如相对于亚太地区而言，东盟即为次区域；相对于东盟而言，新－柔－廖成长三角即为次区域；相对于新－柔－廖成长三角而言，廖内群岛即为次区域。相对性是次区域的基本属性，因此，在不同的场合，适应不同的需要，它也可被称为区域或地区。

（2）关联性。

次区域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它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个或几个方面具有关联性。如，同在珠江流域，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具有极大联系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和地理因素而组建的东盟；虽然被国界隔断，但因为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还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的跨越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跨越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跨越比利时和荷兰的布拉克曼地区，等等。

（3）互补性。

次区域作为一种区域，其各个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包括各种资源的互补、技术和管理的互补、利益的互补等。一般来说，由发达国家（或其某一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或其某一地区）组成的次区域，往往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又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资金优势。如环日本海经济圈，日本和韩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俄罗斯和中国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能够形成非常好的互补^[12]。

（4）整体性。

整体性不仅表现为当以区域的名义行为时，各个构成部分必须以整体的名称出现，更多的是表现在其对内对外政策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为了各自的利益，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次区域必须要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协商并最终达成统一^[13]。如在贸易政策上各成员国之间统一关税或者关税互利，但对次区域外部的国家则实行一定程度的关税壁垒；在一些重大的涉及共同利益问题上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

3.2 多层治理理论

多层治理理论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欧洲过去分合的历史和当代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践为依据提出来的,从治理模式的角度揭示欧洲联盟内部国家间如何协调利益冲突,以至形成一个运作有序的共同发展整体的理论。

3.2.1 多层治理的基本内涵

多层治理的思想源于治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多层治理看作是治理理论在国际合作或区域合作中的运用。在政治学领域,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14]。在区域经济学领域,治理被定义为:内生于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形成群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实现组织主体的集体活动,设定并实现组织的功能和目标。从上述治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主要局限于横向协调,而缺乏纵向协调。欧盟的多层治理模式则是兼有横向和纵向的双维度的治理模式,因此,多层治理理论除了具有一般治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外,还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

多层治理最初是盖里·马克斯(Gary·Marks)于1993年在对欧洲共同体的结构政策进行分析时提出的,随后经过马克斯本人和里斯贝特·胡奇(Liesbet·Hooghe)、贝阿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彼特斯和皮埃尔(G. B. Peters and J. Pierre)、艾德伽·葛兰德(Edgar Grande)、弗里茨沙普夫(Fritz W. Scharpf)等多位学者的发展,该理论日臻完善^[15]。他们把多层治理定义为:多层次治理是在以地域划分的不同层级上,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诸多行为体之间所形成的通过持续协商、审议和执行等方式做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过程。这些行为体中没有一个拥有专断的决策能力,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固定的政治等级关系。

3.2.2 多层治理的特征

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多层治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参与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和决策主体的多层级性。在多层治理这一治理模式构架下,有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在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决策权限由不同层面的行为体共享,而不是由成员国政府垄断,治理的进程也不再排外性地由国家来引导。从决策权分布的领域来看,欧洲治理并非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或某个超国家机构手中,而是散布于以地域为界的不同层级之中,超国家行为体、国家政府、区域行为体(如地方各州政府)以及拥有执行权力的代理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直接参与决策。尽管不同层面的行为体、影响力和决策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各个层面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而是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职权上交叉重叠、在行动上相互依赖、在目标上协调一致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决策模式。

第二,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是非等级的。也就是说,超国家机构并不凌驾于成员国之上,并且成员国、次国家政府与超国家机构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虽然像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在其政策管辖范围内具有特定权限,但这种权限的效力范围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同时,各成员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是通过集体决策机制体现出来的^[16]。在此过程中,单个成员国对决策的控制能力正在逐渐下降。此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糊了国内